



流动的童年

贵阳农民工随迁子女的爱与希望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李雅娟

发现

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主任熊春文，从2017年起，带着学生开办周末成长营，为流动儿童提供成长性课程。流动儿童研究只是他农业农村研究中的一小部分，却一直让他割舍不下。

主流社会学理论对于这些孩子的研究范式是反学校文化研究（一般指反抗学校主流文化和教师权威，包括不服从、消极对待、对抗等 编者注），但在和流动儿童长期相处的过程中，熊春文意识到，仅仅关注反学校文化是不够的，需要迈向更为积极的流动儿童群体文化。

中青报 中青网：您从2005年就开始关注农民工和流动儿童群体，当时有什么契机？

熊春文：我是2005年博士毕业来的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关注城乡问题，中国农大又特别关注农业农村问题，农民工其实是在城里的农民，我们很容易就会关注到这个群体。

我们曾去到北京市海淀区东升镇的八家村。进去之后发现里面有很多小孩，大都在农民工子弟校上学，放学后都是散养式的，没人辅导功课，还有一些很早就辍学的。我们就免费给他们做家教。

两年之后，那个地方整个拆迁了，这些孩子面临分流。他们有些跟着家长分流到五环外的东小口镇农民工子弟学校（后来又分流到公立学校，其中一所是学府苑小学，就是后来的中国农业大学附属实验小学。我们就跟着这些孩子做了不同类型学校的研究。主题叫流动儿童群体文化研究，一做就是十几年。

中青报 中青网：这两类学校的孩子后来会有什么区别吗？

熊春文：非常不一样。农民工子弟学校有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文化，这种文化总体来讲是非学业取向的。他们知道将来基本上是子承父业。如果在北京待的话，基本上不会参加高考，或者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可能性极小。

在公立学校的，学业上希望大一点，因为公立学校的文化基本是学业取向的。但是公立学校也有不同。最初一批孩子进来的时候独立编班，独立编班的那群孩子，明显还是按照农民工子弟学校那种文化。后来分流的孩子混合编班，逐渐放到市民孩子的班里，慢慢有个融入的过程。

中青报 中青网：做流动儿童研究这么多年，有给您印象比较深的孩子吗？

熊春文：很多。我们最近做一个项目叫寻找吴珂。对吴珂这个孩子我们做了很深入的田野观察和访谈。她坚持写日记，把日记全都给了我们。我们以她的日记为主要的原始资料，做了几篇文章，有一篇叫《制度性自我选择与自我放弃的历程》。

我记得这个孩子开始有留过留的经历，在老家学习成绩就非常好，后来跟着父母来了北京，进入农民工子弟学校，在融入农民工子弟学校群体的过程中一直非常纠结。日记里面，她把自己的心路历程展现得非常丰富；她也希望抓学习，老师很看重她，各科老师都把她看作学校唯一一个将来可以往上考的苗子。但是在那所农民工子弟学校，要学习就没朋友，要朋友就没学习。她就在这个纠结的过程中逐渐沉沦，学习成绩下降得非常厉害。后来家长还是把这个孩子送回老家了，最后她考上了长春的一所大学。

我们最近想做一个这样的研究，在这十几年来孩子里选十来个进行重访，让他们讲出自己的故事，回过头来看看这一段流动经历在他们的人生当中意味着什么。吴珂只是一个例子，代表了学习成绩好的，在群体文化的影响下几乎自我放弃最后又自我救赎的类型。还有别的类型。

中青报 中青网：您在农业大学开展周末成长营，陪伴流动儿童，还开展了社会性成长的项目。做这些项目，有给您印象比较深的事情吗？

熊春文：比如怎么处理亲子关系，在这个群体里面是非常难的问题。

父母的关注是长期缺乏的，尤其是父亲很难关注到孩子。因为他们的劳动强度非常大，学业关注不到、心理问题更关注不到，所以亲子关系比较紧张。孩子不愿意跟家长讲话，经常吵架。我们做过一个研究发现，流动儿童对父亲的评价往往是偏负面的，用很多非常不好的词来形容自己的父亲。

有些家长特别希望我们在亲子互动的技巧方面辅导一下他们。因为孩子大了会逆反。但他们一忙，根本就不了解不了孩子，容易粗暴式管理。

他们自己很辛苦、很累，辛辛苦苦都是为了孩子，最后又得不到孩子的理解，双方都很难。

中青报 中青网：做流动儿童研究十几年，您有什么感触吗？

熊春文：我写过一篇文章叫《迈向积极的流动儿童群体文化研究》，我觉得这代表了我们对这个问题总的思考。

在这个领域，国际上主流的研究范式是反学校文化研究，我们经过这些年的研究和体悟，认识到仅仅关注反学校文化是不够的，需要迈向更为积极的流动儿童群体文化。

哪怕最后大多数流动儿童还是不能实现阶层跃迁，但是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比如这代父母这一代从事的可能是制造业为主的职业，或者是绿化、厨师、保洁这些工作，新一代做的可能是跟金融、互联网有关的工作，或者是学前教育、医院护理这样的工作。这是时代的因素，他们这一代的文化跟上一代的文化不是简单的复制。尤其是我们关注的大学后勤职工子女群体，他们因为生活在大学里，接触了大学生的文化，所以学业抱负很高。

我们的大孩子里面，有很多表现非常好的，比如小升初推优，很多流动儿童的学业成绩和各方面表现都很好，将来他们当中很有可能出来一些特别优秀的人。

我们研究的孩子们当中，有一对姐弟，姐姐考上了天津的海事学院，弟弟考到了沈阳农业大学，弟弟的志向就是将来考中国农大农大的研究生，这肯定跟我们开展的工作有关。他们都是这个项目的积极参与者，也是受惠者。那些大学生哥哥姐姐对他们有非常好的激励作用，他们也愿意把我们的团队成员当作知心朋友，愿意分享心里的事。



近年来，团广西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委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苗家小镇、苗美社区开设青年之家、六点半小课堂，定期组织青年志愿者，为这里的青少年开展功课辅导、自我保护、科技小课堂等活动，丰富了这些随迁青少年的课外生活，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新的学习生活。

家长的缺席，让他们早早当家

沉重的生活压力、较低的文化水平，让家长几乎缺席了孩子的教育。有段时间，一所民办学校的语文老师卢璐注意到，班里一个女生连续几天都上学迟到。这天早上，小女孩又没来上学，卢璐给家长打电话，一直打不通。卢璐找到学生家里，发现父女俩都在呼呼大睡。父亲抱歉地说，他每天晚上工作到很晚，早上醒得也晚，没法叫孩子起床。

一位民办学校班主任告诉记者，班上很多孩子的父母都年轻、贪玩。有个学生告诉她，放了学，自己和父母各自抱着手机打游戏。书面作业，学生往往在学校就写完了，而古诗背诵等口头作业，很少有学生能够完成，老师得在上课时时间督促。

由于家长角色缺失，卢璐在孩子们身上看到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早熟。卢璐所在的这所民办学校，绝大多数学生都是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她看来，这些孩子自理能力很强。高年级的孩子放学回家，要帮父母做饭、带弟弟妹妹写作业。如果家里用蜂窝煤炉，孩子们还要自己生火。有学者在调研中发现，有的流动儿童放学后还要帮父母一起做生意。

卢璐曾教过一个男孩，到男孩家里家访时，这名资深语文老师只能想到“家徒四壁”这个词：男孩家的床上只有简单的铺盖，3个孩子挤在一张床上，爷爷睡在隔壁房间。家里除了床、炉灶、锅碗瓢盆，几乎没有更多东西。这个孩子10岁才读一年级，他不在学校吃午饭，每天中午都回家给弟弟妹妹做饭。

让孩子多参加动手类活动，也成为一些公益机构帮助孩子的切入点，手工、农耕、烹饪等课程都很受孩子们欢迎。在一所民办学校的烘焙教室里，放着烤箱、长桌、可移动电视，食堂阿姨和接受过烘焙培训的老师负责教孩子们。由于场地、经费有限，想参加的同学又很多，大家就“抓阄”决定。四年级男生刘恒有些不好意思：第四次才轮到我。

在老师和食堂阿姨的指导下，几个孩子分成一组，分别负责倒面、和面、揉面、烤制。刘恒喜欢揉面，他说自己很享受把面团揉成各种造型的过程。除了揉面外，他还在团队中负责“监督”烤饼干。生面还送到烤箱后，刘恒会寸步不离地

守在烤箱旁。每个孩子可以分到10块亲手烤制的蔓越莓饼干，刘恒给好朋友分一点，剩下的拿回去分享给爸爸、妈妈和姐姐。

贵阳有所民办小学连续开了四五年烹饪课，孩子们做出的点心、月饼不仅自己吃，还拿出一部分卖出去。孩子们学着自己联系买家、记账、维护客户。双减政策落地之初，有教育专家来这所学校参观，对丰富的课后活动惊叹不已：没想到你们都做得这么成熟了！

进入公立学校几年后，流动儿童在成绩和表现上和本地儿童无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一位民办学校的老教师告诉记者，他过去的学生有的在上海或成都等地的知名高校读了硕士、博士，让他颇为自豪。在这名老教师所在的民办初中，几乎每年都有学生考上贵阳一中、观山湖一中当地优质高中。

温诚曾为一个流动儿童发放过助学金，女孩家长伸出沾满泥巴的粗糙双手接过钱。夫妻俩在建筑工地当小工，收入不高。在温诚看来，那个女孩是个真正的学霸。不少孩子靠上补习班来提升成绩，但她从没上过补习班，还考上本区一所不错的公立高中。这个女孩还很喜欢读书，阅读量很广。有一次，温诚所在的公益机构举办赠书活动，孩子们可以去指定书店选一本书。女孩兴奋地说：太好了！又有书看了！

但这样的个案又实在屈指可数。去年年初，贵阳市关停了大量民办学校，流动儿童分流到公办学校。少数保留下来的民办学校，由政府购买服务。政府给学生提供学费补贴，学生只需要自付几百元。对于分流到公办学校的孩子，温诚担忧：公办学校无差异化设施更完善、教师素质更高、课余时间也更丰富，但他又担心孩子们会难以融入新的群体，或受到歧视。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人口流动与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主任陈媛媛曾做过调研，2008年，上海中心城区关闭了所有的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全部转入上海中心城区的公办学校。那时流动儿童与本地儿童的差异很大。

但几年后，陈媛媛团队对上海11所公办学校的调研发现：在相同的学校里，流动儿童在学习成绩、学校表现、担任班干部情况、心理健

康，或者是老师对学生的评价等方面，和本地儿童都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流动儿童教育有更长远的意义

每次下班，吴芳总要一遍遍地赶孩子们回家。这天下班后，吴芳还得帮一个孩子买花种。学校要求带花种，但这个孩子告诉吴芳，妈妈不给买，她想请吴芳帮忙。

孩子们很依恋儿童中心的志愿者，相比于经常不在家的父母，儿童中心成了他们最熟悉、最信任的地方。有时儿童中心不开门，还有孩子翻墙进来玩。孩子们对爱的渴望，也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有次儿童中心上兴趣课，一个调皮的男生搬了凳子坐在讲台上，年轻的志愿者老师每说一句话，他都大声吼叫。老师制止了几次，他都一副无所谓的样子。那天课程结束后，这个让人头疼的男孩紧紧跟在志愿者们身后，恳求他们多待一会儿，或是带自己一起走走。

还有一个调皮的女生，总是嬉笑着要跟志愿者老师打闹。上完课，年轻的女老师锁了大门，她紧紧地抱着志愿者老师，不愿离开。儿童中心一向人手紧缺，志愿者流动很频繁。后来的课上，看到新来的志愿者，这个小学女生眼神茫然，她反复问：老师，你会离开我们吗？你会一直陪着我们吗？

与流动儿童群体接触这么多年，温诚也有深深的无力感。不少孩子家庭环境特殊，仅凭公益机构的力量，难以给他们带来实质的改变。只想给孩子们童年留下一点快乐的回忆吧。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建议，应该尽快修改义务教育法，在立法层面保障流动儿童在父母工作和居住地接受高中教育。

他建议，要进一步推进中央有关教育的财政转移支付与人口流入地吸纳外来人口落户的数量、外来人口随迁子女就读数量挂钩。督促人口流入地地方政府加大教育投入，确保中小学教育逐步覆盖外来人口随迁子女。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陆铭关闭了，谈子女的教育问题除了是一个教育问题外，实际上对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有更加长远的意义。（应受访者要求，吴芳、小奇、温诚、卢璐、刘恒为化名）

打架是他们的沟通方式

2月中旬，贵阳湿冷的冬季还没结束，儿童中心的空调吹着暖风，一股刺鼻的气味愈发明显。那是孩子们身上的气味。这个儿童中心所服务的孩子，大多随父母租住在城中村。月租三四百元的房子没有配套的卫生间，只有小小的公厕，有人形容，连蹲下都困难。浴室就更少了。

小奇是儿童中心众多孩子中的一个。在儿童中心，他经常跟别的孩子打架，颇让吴芳头疼。但吴芳又心疼他：小奇从小被亲生母亲抛弃，继母经常打他。可想而知，在这种家庭环境下长大的孩子，打架就是他的沟通方式。常来儿童中心的孩子中，小奇不是最特别的一个。

贵阳一家公益机构的负责人温诚告诉记者，许多流动儿童的家庭环境非常复杂，父母离异的情况颇为常见。在最复杂的家庭里，配偶双方可能都带来上一次婚姻的子女，又生育新的子女，有的家庭多达七八个孩子。有些孩子跟随爷爷奶奶租住在贵阳，孩子父母远在外省打工，爷爷奶奶在贵阳做些零工。这样的孩子被称为“二次留守儿童”。有时老人有事回趟老家，只留孩子独自在贵阳。

在这样的家庭中，年龄较大的孩子早早就要背起生活的重负。有的父母要求，大孩子要去儿童中心玩，必须带着弟弟妹妹一起去，不然就要在家带弟弟妹妹。吴芳对此有些无奈，儿童中心原本只接受上了小学的孩子，现在不得不承担更多责任。有次一个幼儿园小朋友尿湿裤子，吴芳得一边照顾几十个孩子，一边帮这个孩子换裤子。

温诚说，他所在的公益机构经常会来一些调皮的孩子，因此，对孩子要求严格的家长认为这里“坏孩子”太多，不允许自家孩子来；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家庭，可能会送孩子去上兴趣班，也不会送来公益机构。这些孩子的未来不能不让人忧虑。

一位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检察官向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谈到类似现象：查办涉未成年人案件中，不难发现，父母经常吵架或离异家庭的农民工随迁子女，走上歧途的概率更高。更有甚者，有些触犯刑法的孩子在附条件不起诉的考察期内，家长仍然常常失联。

有些公益机构尝试用艺术来引导孩子们，比如通过绘画课程增加孩子的耐心。经过一年一年的训练，孩子们从最初的连半小时都坐不住，到能耐心地用油画棒涂满一幅画，还能发挥想象，让画面语言更丰富。温诚感慨，经过这样用心陪伴的孩子，与人打交道会变得温和一些，打架次数也会减少。

融不进，回不去的流动青少年需要什么

事务中心（以下简称“阳光中心”），作为副总干事，他目前主要负责服务群体的分析研究工作。阳光中心是由共青团上海市委主管的社会服务机构，自2004年成立以来，一直运用专业方法开展就业创业、社会融入、生命健康、助困增能、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等服务，特别是在预防青少年犯罪方面，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经验。

流动青少年需要什么，我们就尽量提供什么。张瑾瑜介绍，考虑到这个群体的流动性大，阳光中心采取了以固定阵地和重点场域为抓手、覆盖青少年群体的工作思路。

随着城市的发展，阳光中心先后到来沪人员较多的七浦路服装批发市场、豫园小商品市场、虹口灯具城、青浦区工业园区等地建立站点，由社工入驻开展服务。社工会进入看守所、拘留所，为在押青少年提供法治意识宣传、人际关系修复、生存技能提升等服务。此外，他们还开展来沪二代子女助学成长项目，在学校和社区招募服务对象，提供沪语学习、艺术类课程和亲子沟通等服务，帮助孩子们丰富童年、融入社会。

张瑾瑜告诉记者，阳光中心面向羁押在拘留所和看守所的流动青少年开展的服务，是针对他们的心理状态和生活需求设计的。社工会正在进行生命历程访谈时，挖掘影响流动青少年产生犯罪行为的因素。比如，他们都是抱着改善生活的目的来到大城市，为了挣钱，可能会从事传销、盗窃、诈骗、色情服务，或者被身边人影响，发生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行为。在监所中，他们的情绪往往呈现从紧张、焦虑，到麻木、失望，再到出所前的迷茫，这样的循

环状态。如果我们能帮助他们树立良好的价值观，改善他们的人际关系，增强与重要他人的联结，做好生涯规划，提升文化素养和职业技能，无论他们过往的背景如何，只要有目标并为之努力，相信他们都能远离犯罪，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张瑾瑜说。

小胜（化名）是一名来沪务工二代，父母都在饭店工作，一家三口曾住在临时宿舍里。由于缺乏家庭归属感，小胜在社会上结识了一群“好兄弟”，整日玩乐。一晚，兄弟们囊中羞涩又想要消费，便煽动小胜一起去实施抢劫。由于小胜犯案时是未成年人且是初犯，检察院委托阳光中心的青少年事务社工进行社会观护帮教工作。

在看守所内被羁押了50多天又被转去工读学校，小胜觉得自己被贴上了“坏孩子”的标签，情绪变得低落，开始自暴自弃，在校经常与人发生冲突，成绩也一落千丈。社工一方面陪伴鼓励小胜度过情绪波动期，另一方面着手修复他与父母的关系，帮助他的父母提升家庭教育意识与能力。小胜顺利度过了考察期，参加了中考。帮教结束后，小胜一直和社工保持着联系，汇报自己的进步。职高一年级时，他期末考试考得不错，进了年级前十。二年级时，他担任了学生会干事。毕业后，小胜进了一家新业态的科技公司做项目主管。3年后，小胜在昆山贷款买了房，他和父母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又过了3年，小胜符合苏州的人才引进标准，将户口迁到苏州，开启了创业之旅。阳光中心副总干事、负责全市各区重点工作



阳光中心的社工走进拘留所开展宣讲。受访者供图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魏其臻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帮助涉罪未成年人回归社会等问题，成为一些代表委员的关注重点。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近年来大城市的流动青少年犯罪问题逐渐凸显。据统计，在上海，来沪青少年犯罪在25岁以下青少年犯罪中的占比处于高位。

有着十几年社会工作经历的张瑾瑜向记者描述了一个普遍现象：一些青少年从小以留守儿童的身份在农村或偏远地区长大，因为缺少家庭教育和教育资源，农村对他们已经没有吸引力，长大后来到大城市找工作，由于生活成本高、社会资源或自身技能不足等原因，很可能会去高强度、低技能的岗位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处于“融不进，回不去”的状态，感到迷茫和焦虑。他们往往会以家乡或共同经历等因素形成集群，在面临“呼朋唤友”的情绪裹挟或遇到街头的诱惑时，就有可能出现偏差行为，甚至去实施犯罪行为。

张瑾瑜所在的机构是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